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苗学辑

贵州苗族 调查资料

费孝通等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苗学辑

贵州苗族调查资料

费孝通 等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编者的话

中国的文化地理，可以作多种的解读：以秦岭为界，以北为北方旱地小麦文化，以南为南方稻作文化；以爱辉—腾冲划线，线之东为农耕文化，线之西为游牧文化；以地方特色名，又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大而划之，又可分为三种文化圈或称为文化版块：蒙藏的佛教文化圈、新疆的伊斯兰教文化圈，除此而外，所有版图均为儒家文化圈。于此编者所欲说明者，处儒家文化圈内的云贵、湘西、桂北，似乎更应该独立为“巫文化圈”。巫文化是中国文化源头之一。上古之时，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立庙堂，而后独尊史官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一统天下之势，“巫”的处境每况愈下：被逐出庙堂、逐出中原，退而居于西南一隅，在土著中苟延。如此看来，西南土著中保有的巫风，恰是中华文明的渊源之一。

昔以中原为中心的儒教文化依“五服制度”分野，贵州地处“要荒”，位列边缘。但若以“巫文化”视之，贵州却正是“巫文化圈”之中心，所谓“西南之奥区”。在中原失落了的巫文化体系，恰好在贵州得以保存。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梳理，可称上符“礼失而求诸于野”的古训。

以人类学的眼光看贵州本土文化，大概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19 世纪末，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传入中国，贵州就成为重要的对象研究地。从早期的传教士、西方学者，到中期的国内学者再到近期的本土学者，文化人类学在贵州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并形成了大批成果，成为了研究贵州省情和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视角。我社将对以往的贵州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作一爬梳，选编出六个专辑共 60 册一套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以“六十名著”诠释“六百年贵州”。

作为分外之想，我们期望这套丛书成为研究贵州文化史和少数民族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库。如同我们的先辈文通书局曾出版的“黔南丛书”一样，我们期以此套出版物能够推动地方文化史和贵州的“原生”精神文明的研究，甚至促成“贵州学”和“贵州学派”的诞生。

2014 年，第 24 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贵阳召开，我社在已出版《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丛书的基础上，遴选出两辑 15 册，作为“书博会”的献礼。

本辑为“苗学辑”，共 10 册。

出版前言

苗族，就其人口数量言，是中国第五大民族，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苗族有 894 万人。苗族同时又是一个分布世界的民族：在东南亚各国的苗族有 200 多万人，美国有 30 万人，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共有 5 万人。苗族还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距今五六千年前，苗族先祖蚩尤就同华夏族领袖黄帝、炎帝逐鹿中原并称为中华文明三祖。千百年来，苗族因战乱所迫，迁徙无恒，最终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才找到生存之地。现今贵州的苗族有 400 多万人，约占全国苗族人口的一半。贵州是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苗族也是贵州除汉族外人口最多的民族。

研究苗族和苗族文化的学问叫“苗学”，古代贵州的“苗学”文字，大多来源于地方官员，如李宗昉的《黔记》、爱必达的《黔南识略》、严如煜的《苗防备览》、田雯的《黔书》、胡宗绪的《苗疆记事》、龚柴的《苗民考》、贝青乔的《苗俗记》、徐家千的《苗疆闻见录》等。最大规模的“民族调查”有清代组织的《百苗图》编绘。但上述著述大多立场偏颇，观念“正统”，又只是为“王政”或“战事”服务，不足以称为真正意义的“学（-ology）”。

运用现代学科方法而发轫的“贵州苗学”著作，来源于西方传教士和早期人类学家，如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萨维纳所著的

《苗族史》，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克拉克、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等人大量的调查报告，还有日本早期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这些著作大多产生于19世纪最后十几年至20世纪最初的20年，可以将它们看作是“贵州苗学”形成的初期阶段。换句话说，“贵州苗学”研究始于西风东渐。这使得“贵州苗学”研究从一开始，便具有“国际”的视野。之后出现的《贵州苗族考》（1929，杨万选著）可以看作是贵州苗学研究初期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过渡。

20世纪30年代后期，因为抗日战争，大批大学教授和学者内迁贵州，从而促成贵州苗学研究的高潮。这一期间，贵州苗学研究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水平学者带领下的有组织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活动；二是苗族群体中出现的学者提供了“自述”的视角与研究。当年，闻一多等名教授带领的西南联大学生在贵州境内的采风；大夏大学成立了由名教授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徽等领衔的“大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编辑了有关贵州少数民族方面的专门刊物：《大夏大学民族学论文集》、《苗夷研究丛刊》，出版发行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新谣》、《贵州苗族概论》等著作。这一时期，苗族学者已初露锋芒，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梁聚五氏，其著有《苗夷民族发展史》；若杨汉先氏，则著有《大花苗迁入乌撒考》等；王建明氏，撰有《西南苗民的社会形态》等文；王建光氏，撰有《苗民的文字》等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50至60年代，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和民族教育院校。我国的民族学者和人类学者也为配合民族自治、民族识别等工作，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为贵州苗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期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编印了《苗族社会历史调查》，编写了《苗族简史简志》；各民族自治的地方也编写了相关概况。大量调查中的“采风”作品也都收入《民间文学资料》得以编印流通。这一阶段，贵州苗学研究最大特色是“政府行为”——由政府组织得以实施。

“文革”期间，贵州苗学研究和其他任何社会科学一样，沦为空白。

虽然，此期仍不乏罕见成果，如台江农民王安江为搜集苗族古歌的艰苦努力——他从1968年开始，行乞为命，周游各地，徒步跋涉数万里，收集整理了完整的《苗族古歌》，至今仍然是值得为之赞叹的壮举。

改革开放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的“文革”造成的十年空白之后，民族文化的研究与重建取得了丰硕成果，贵州苗学研究也成果斐然。这期间，主要的苗学研究著作有：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杨庭硕的《百苗图研究》，翁家烈的《苗族文化论》，麻勇斌的《神性妇女研究》，杨培德的《鼓魂》，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罗庭华、余岛的《贵州苗族文化教育研究》，徐新建的《苗疆考察记》，石朝江的《中国苗学》等。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来自苗族内外，也来自海内外。相关的涉及苗族的研究，在比较化学、比较宗教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的各种视角下，更是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进入21世纪以后，除了继续发展和繁荣的势头，苗学研究进入到“整合”阶段，有了大部头的《苗族通史》的面世，《20世纪苗学研究百部文库》首次出版第一辑便有10部；时间跨度近百年的《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也由英、苗、汉学者共同完成；首部集可视、可听、可读的《王安江版苗族古歌》也由本社出版。贵州苗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本丛书第一辑将目光集中在过去百余年来贵州苗学研究的发展轨迹，努力保留各个时期的阶段性代表作品。作为早期苗学开拓阶段的重要著作之一，萨维纳所著的《苗族史》一直未能译成中文，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我们从国家图书馆找出原书并组织了翻译；曾被称为“苗族救星”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写过《苗族纪实》，另一英国传教士克拉克著有《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此二书现合并刊行；日本早期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在1936年曾经刊行，作为早期苗学开拓阶段的代表作品此次亦作再版。

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末，是苗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

此期间我国重要民族学者的著作中，我们选了杨万选著的《贵州苗族考》（1929）与吴泽霖、陈国钧、杨汉先等人的文章合为一册；苗族学者梁聚五著的《苗夷民族发展史》则更名为《苗族发展史》独立成册。

50年代至60年代，因贵州民族出版社曾出有大量民族地区的调查报告，我们仅选载了著名学者费孝通“劳动的苗家”与中央民族调查团的一份调查报告和调查资料合为一册，用以反映当时的调查观点和调查方法。

80至90年代，是改革开放后苗学研究恢复发展的时期。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和石朝江的《中国苗学》，也是此时期成果丰硕的苗学研究的代表。进入新世纪以来，海外苗学研究日趋繁荣。考虑到苗学研究的这一现状，我们选择了美国学者路易莎和台湾学者简美玲的新著，以期读者能够了解海外贵州苗学研究的趋势和前列学者的成果。

区区十册，难免挂一漏万，还望贵州苗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原宥。作为贵州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部分和成果最多的部分，“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一辑刊行的是“苗学研究”的部分。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贵州苗学研究各个时期的特征和认识水平，除对少数民族侮辱性的称谓作了删改外，尽可能保留原著原貌。另外，有些文章的著作权人一时未能联系上，为其大作早日出版，泽惠学林，不得已只好先行采用。我们恳请原作者或著作权继承者海涵原谅，并请与本社联系。

出版者

序

贵州是苗族聚居的大本营，贵州也应该是苗族研究的大本营。18世纪下半叶以来，贵州苗学从“潜流”（未有苗学研究之名但已有苗学研究的著作）变为“洪流”（20世纪80年代为“苗学”立名并产生大量研究成果），也与“藏学”一样正在成为一门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显学”。不管怎么说，贵州苗学从来就是贵州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间文学研究的主流。

贵州有许多优秀的苗族学者和苗学研究著作，也有许多优秀的国际学者研究贵州苗学。这是贵州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也是贵州文化建设的一笔重要财富。贵州大学出版社将贵州苗学发展历程的梳理和贵州苗学重要著作的集成放在其向贵州建省600周年献礼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一辑出版，感到可喜可贺。出版社同志嘱我作序，千言万语无从下笔，写下几句感言，是为序。

王朝敏

（原贵州省省长、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苗族）

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政府和贵州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力量对贵州民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习惯等多个方面。本册收录了负责本项工作的费孝通先生的《劳动的苗家》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从江县加勉乡苗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和《近代贵州苗族地区农村生产关系资料》。

目 录

劳动的苗家	1
从江县加勉乡苗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13
一、经济状况	15
附录	91
二、历史传说	95
引言	95
从江苗族的来源	96
从江苗族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	108
三、婚姻	125
配偶的选择	125
婚姻的缔结	143
对婚姻不满及婚姻中断的处理	153
附录	159
四、节日	167
吃鼓藏	167
附录	194

踩秧堂.....	218
开秧门.....	219
尝新包谷.....	220
吃新饭.....	221
“诺格刹”.....	222
开禾仓.....	222
吃仓饭.....	223
喊禾魂.....	223
“拖舍歹”.....	224
敬玉皇大帝.....	226
苗年.....	227
客家年.....	228
五、丧葬.....	229
概述.....	229
治丧过程.....	230
一般禁忌.....	239
非正常死亡的丧葬.....	240
六、习惯法和风俗禁忌.....	242
习惯法.....	242
风俗禁忌.....	254
近代贵州苗族地区农村生产关系资料.....	259
一、近代贵州苗族地区农村生产关系资料.....	261
土地的占有情况.....	261
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情况.....	264

二、炉山县瓦窑寨苗族解放前阶级情况.....	274
三、凯里解放前的税捐调查.....	277
四、凯里公社棉席管理区苗族解放前典型材料....	285
五、丹寨苗族地主的产生及其他有关方面的调查资料	287
六、贵州织金箐脚乡解放前的阶级关系.....	295
七、贵州织金猫场地主李兴发的剥削情况.....	298
八、织金苗族解放前典型户经济调查.....	301
九、平坝县苗族解放前阶级情况.....	305

劳动的苗家

费孝通 著

苗岭山脉的北面，流着一条清水江，是沅江的上游。清水江从它的水色得的名：碧绿的一股水，蜿蜒曲折，奔流在万山丛中。从黄平的重安江和麻江的下司场往西，都可以通航浅底尖头的小驳船。从这里离开公路进去，就可到苗族聚居的区域。贵州第一个成立民族自治州的凯里就在这清水江畔。在地图上，把炉山、台江、雷山、丹寨四个县城作为四点，用铅笔画成一个正方形，这个正方形就是贵州苗族的中心区，里面的山地大部住着苗家，虽则商业中心的市镇上，照例是住着汉人。从全区人口数量上说，苗族要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中心区四围是苗、汉及其他民族的杂居区，所占百分比不等。此外零星的苗家或少数居民，分散在其他民族的聚居区内，范围很广，不限于贵州。贵州苗族总人口在二百万左右。在数量及历史上看，苗族是西南的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

我们在苗区访问了四十天，从龙里起到镇远止，其中又在黄平和炉山离开公路线，深入苗族聚居的湾水、谷陇、凯里等地区，一路上看到：凡是山凹里，山水能灌溉得到的地方，一层层地筑着梯田；山坡上凡是土比较厚的地方，一片片种着包谷。山地有高低，山坡有阴阳，作物成熟得有迟早。我们经过时稻田有一部分已经收割，一部分正在收割，还有一部分没有熟。正在收割的田里，就可以看

到成群的苗家男女忙着工作。苗家的男子，和汉人在表面上已不容易分辨，但是妇女在服饰上却还充分表明她们的民族形式：头上扎着帕子，两袖和衣襟上绣着花边的上衣，下面是百褶长裙，赤着脚。从头帕到长裙都是深紫色——这是被称为“长裙黑苗”的装束。

这里必须插一段说明：贵州苗族内部又有很多名称，主要分：黑、白、红、青、花五种。这些名称是根据他们妇女服色来区别的。黑苗穿的是一种深紫色的衣服，远望去是黑黝黝的，所以称黑苗。他们分布在黔东一带。白苗妇女的裙子上有一圈是白色的，分布在黔中。红苗在黔东北松桃一带，我们没有去。青苗穿青布衣裙，在贵阳附近。花苗的男女都披着绣着花的衣肩，在黔西的赫章、咸宁一带。各种苗中还有分别：比如凯里附近的盘溪也是黑苗，但穿短裙，裙子刚过膝，下腿另有绑腿，称作“短裙”。在龙里一带还有些苗家妇女背上挂着贝壳作为装饰，称作“海贝苗”；有些头上梳个髻子，称作“纠纠苗”。此外又有从他们住处称呼的，如“高坡苗”。像这类名称很多。这是山岭阻隔，经济分割，互不往来，各地方的苗家住久了，发展了各自的特点，在风俗习惯和方言上有了若干区别。但是所有的区别并没有掩盖他们基本上共同的民族特点。

一般的说，苗家妇女的服装还很少受汉族的影响，我们只在贵阳和镇远遇到过穿汉装的苗家妇女。苗家妇女服装上最明显的特点是穿裙子，而汉人却穿裤子。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在场坝上（市集上）常常发生“挑裙子”的侮辱行为。杨森在贵州当政时又推行剪发改装的同化政策，派了兵在街上守着，看见苗家妇女就强迫把她们头发剪短，把裙子剪破，还要敲一笔“改装费”。这样把苗家妇女吓得不敢上街。妇女怕改装，男子怕拉兵，那一个黑暗时期，街上很少看到苗家，城乡就这样被隔离了。

苗家妇女对她们的服装特别宝贵，因为这是她们从小一针一线长期劳动的结果。普通都是自己种了棉花，纺了线，织了布，染了色，绣了花，费了多少年的精力才完成的（不出棉花的地方就种麻。